

# 中国文化简史

ZHONG GUO WEN HUA JIAN SHI

赵国良 主编

郑州轻工业学院法政系

二〇〇三年三月



## 前 言

从社会发展的趋势看,21世纪是更加尊重知识、更加注重人才素质全面提高的世纪。从21世纪对人才的需求和当今经济、科技发展的现状来看,我国原有的人才培养体系有许多不相适应的地方,人文教育薄弱就是较为突出的一点。实践证明,加强大学生特别是工科院校的大学生的文化素质教育,对于素质教育的实施,对于培养适应21世纪社会发展需要的高素质人才,具有重要意义。对工科大学生加强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等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教育,是提高学生整体素质必不可少的手段之一,为此,我们尝试编写了这部《中国文化简史》。

本书宗旨在于: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为指导,以翔实的史料为依据,勾勒中国文化赖以繁荣发展的历史素地,描绘中国文化绚丽多姿的丰富内容,揭示中国文化在中国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在当时世界上的领先地位,从而为弘扬民族文化,振兴中华的伟大事业尽绵薄之力,并为高度发展的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提供有益的借鉴。本书强调知识性,但不是一般性的知识读本;强调学术根基,但不是纯粹性的学术专著;强调可读性,但不是违背史实的任意杜撰;强调个人新见,但不是只顾新异的凿空立论和华而不实的游戏笔墨。浓郁的文化观照反思和多出新见卓识是本书的特色和追求。本书是以把人类历史文化的沿革粗分为石器时代,即史前社会;青铜时代,即远古社会;铁器时代,即近古社会;电气时代,即近代社会;信息时代,即现代社会的线索而展开与剖析的。《中国文化简史》在编写过程中,力求展示中国历史文化演进的轨迹,探求在不同历史时代人类文化与自然环境社会政治经济的关系,并特别重视阐释人类文化对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从而使大学生全面地、多角度地、立体地掌握中国文化史内容。学习《中国文化简史》就是为了进一步激发大学生学习历史的积极性,扩大文化史知识面,了解中国文化发展规律和趋势,培养对文化进行综合分析的思维素质,从更宽更广的角度去认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学会从文化角度分析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的方法,以适应未来社会的发展需要,使他们能够充分地理解过去,投身社会,创造未来,具有较高的创新意识和较强的实践能力,以充实丰富自己思想的与时俱进的精神,张扬人性自觉意识、人格自尊观念和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

# 目 录

|                           |       |
|---------------------------|-------|
| 绪论 中国文化现代化历程的哲学省思·····    | (1)   |
| 第一章 中国政治文化的成熟——青铜文化·····  | (11)  |
| 第二章 中国学术文化的兴起——诸子百家·····  | (24)  |
| 第三章 中国帝国文化的高峰——汉唐一统·····  | (40)  |
| 第四章 中国民俗文化的漫延——明清变迁·····  | (56)  |
| 第五章 近代中西文化的碰撞——交融汇合·····  | (82)  |
| 第六章 中国现代文化的重建——传统变异·····  | (102) |
| 结束语 人类文化发展的新走势——信息文化····· | (115) |

## 绪 论

### 中国文化现代化历程的哲学省思

自鸦片战争后中国文化被迫走上现代化道路以来,历史已走过一个半世纪。而今,随着新世纪的到来,中国文化的发展又面临着新问题与契机。值此之际,对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思想主题与发展逻辑予以梳理,对其成就与问题予以评析,对于更好地把握中国文化的当代走势无疑是必要的。

#### 一、现代性:中国文化代转型的基本思想问题

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是以“以夷为师”为历史起点的,虽然它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不能等同于西化,但中西文化客观上存在的势差决定了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必然与向西方学习相伴随,对于现代性的追求正是由此成为处在有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的中国文化的基本思想主题。

对所谓“现代性”的问题有着见仁见智的种种争论,我们赞成把现代性最基本的内容归结为理性精神的突显、个人主义的兴起与进步历史观的出现三方面。其中,理性精神的突显居于基础性地位。这不仅是由于理性精神构成了西方文化传统一以贯之的基本理论特质,更是由理性精神在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所决定的。在中世纪,人不仅自觉地变成了神的奴仆,而且面对自然也是十分弱小的。文艺复兴特别是启蒙运动之后,人们发现,正是由于人作为万物之首具有认识与改造世界的理性能力,人完全能够亦应当成为世界的主人。由此,人类开始了在理性的主导下认识进而征服世界的历程。正是理性精神使得人类在一定意义上堪称取代了万能之神的地位:“面对这种理性的统一值,神与人的区别就变成无关的事情了。……管理万物的精神与创造万物的神相似,都是自然界的主宰,与神想像的人具有支配定在主权,是主人,具有指挥权。由此,理性精神的突显成为现代社会区别于前现代社会的基本标志。进步历史观的出现与个人主义的兴起也是建立在认肯人理性能力的基础上的。只有充分显示理性能力,人才能有效的认识,改造社会与自然,从而使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成为可能。同样,现代民族政治的兴起是以公民具有对于自身作为独立政治主体的理性自觉为前提的。如果社会成员对自身所应享有的基本权利、义务与自由没有清醒的认识个人主义显然就无从兴起。在这个意义上,科学与民主可以说都是理性精神的产物。因此,正是理性精神的突显构成了现代性的核心内容,现代性的成就与问题无一不与理性有关,因而人们对现代性的是非毁誉也总是离不开理性的评说。

由于师法西方成为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基本道路,而现代性则构成了西方现代文化的核心内容,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一个重要的价值目标就体现对现代性的追求。与此相关联、与传统中国文化相比,现代中国文化的一个最为显明的特点就在于: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并未得到突显的理性精神在中国近现代文化中逐渐得到显发,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重“德性”的中国文化传统正在逐渐演变为一个为“理性”所浸润的价值系统。尽管由于中国文化现代化的突发性、国人对现代性的认识有一个逐渐明确与深入的过程,但就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整体历程来看,对现代性的追求堪称已贯穿于现代中国文化的全幅层面。在这方面,鸦片战争时期出现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文化范式,戊戌变法中提出的“统筹全局而全变之”的文化范式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打出的科学、民主旗帜可以看做是中国文化对现代性的追求不断从器物层面深入到制度直至理念层面的基本标志。由此,五四新文化的运动也就为20世纪中国文化的发展规划了基本方向精神。发端于这一时期并在日后的发展中鼎足而立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派、自由主义西化派与文化保守主义派,虽然在具体的文化主张与文化内容上有着相当差异,但就基本的理想目标而言,他们都是力图实现现代化的,亦即都是以现代性为其基本思想主题的。

## 二、从“外在冲击”到“内在转化”:现代中国文化发展演进的内在逻辑

就发展演进的逻辑而言,现代中国文化走过了一个现代化的价值理想从“外在冲击”到“内在转化”的过程。换言之现代化始于作为一个外在化的存在而对中国化传统产生冲击,而终于成为内在于中国文化价值思想。

由于在发生学意义上现代化对于中国文化并不具有内发性,因此,对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整体发展而言,“外在冲击”可以说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阶段。一方面,西化浪潮对于中国文化之腐朽传统的揭露、批判,为中国文化现代化价值系统的重建廓清了内涵空间。对于后起的现代化文化系统而言,没有这种外在化的冲击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确立了科学、民主等现代化的价值目标,促使中国文化在被动之中开始走上了现代化之途。

当然,中国文化现代化并没有停留在被动接受外在冲击的阶段,而是在经历冲击的过程中,逐渐开启了通过将现代化为现代中国文化生命的基本价值目标,从而实现由“外在冲击”到“内在转化”之转折的历史过程。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构成了这一历史性的转折点。这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新文化运动标志着西方现代文化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冲击已深入到了精神理念的层面,在形式上可以看做是对中国文化传统中腐朽成分的解构达到了较为彻底的程度。正是在新文化运动中,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终于认识到中西文化更为深刻的差距不在物质与制度层面而在文化理念层面。有鉴于此,陈独秀把精神伦理的觉悟看做是吾人之“最后的觉悟”胡适则进一步提出,“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上不如人,不但机械上不如人,并且政治社会道德都不如人”,姑且不论胡适全盘西化的偏颇倾向,“百事不如人”的结论的确表明当是中国知识分子已清楚认识到了西方现代文化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全幅冲击。可以认为,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标志,西方现代文化对中国文化传统

的批判与解构深入到了核心层面,从而为真正完成中国文化现代建设中,“破”的历史任务提供了可能性。

其二,新文化运动构成了中国文化现代化进程中由“破”到“立”的历史分界线。我们注意到,在有关研究中,不少人着力强调了新文化运动对中国文化传统“彻底”批判的一面。事实上,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众所周知,新文化运动是在中国文化现代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其基本的理想目标是推进中国文化现代化。在这个意义上,激烈的反传统只是为实现理想目标而采取的某种特殊手段。我们认为,尽管新文化运动在整体上确实具有激烈反传统的特征,但恰恰是它构成了中国文化现代化进程中由“破”到“立”的历史转折点。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新文化运动对中国文化传统中已落后于时代要求的有关成分颇为彻底的批判和解构,为中国文化的现代重建提供了基本前提,廓清内涵空间。第二,新文化运动中不仅出现了传统持彻底批判态度的全盘西化派,而且也出现了力图立足于民族本位以重建中国现代文化的文化保守主义派。就其都以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为基本理论出发点而言,全盘西化派和文化保守主义派都应归之于“新文化”的范畴。如果说前者是以一种极端方式表现了解构中国文化传统的彻底性,那么后者则是以一种同样极端的方式表现了建构具有中国民族特色之现代文化的热切性。两者的并存可谓是以一种别致的形态表征了新文化运动即“破”又“立”的基本价值取向。第三,正是发端于新文化运动的自由主义西化派,保守主义的现代新儒家版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派在一起,共同构成了中国现代思想史上鼎足而立的三大思潮,成为推进中国文化现代化的主导力量。由此,新文化运动成为中国文化现代化进程中由“破”到“立”的历史分界线。如果说此前主要体现为一种中国文化逐渐被由外而里不断解构的过程,此后中国文化发展演进的主旋律则是要寻求中国文化的现代重建,即使是全盘西化派,其基本理论目标也依然是要建设现代“中国”文化,尽管其全盘西化的文化建设道路与其理论目标之间事实上是南辕北辙的。

当然,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文化的现代重建并没有径直走上坦途。与20世纪中华民族坎坷的现代命运相联系,中国文化的现代重建亦可谓一波三折。在经历了长期的动乱之后,新中国的成立为中国文化的现代重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却又不幸在一段时间里受到了左倾思想的干扰。随着改革开放时代的到来,中国文化的现代建设终于在一个更为理性,宽和的社会文化氛围中迎来了历史性的新契机。随着对中国现代化历程屡遭挫折之经验教训的反省,随着改革开放后对左倾文化观念的清除与对马克思文化方针的全面贯彻,特别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道路深入探讨,国人对中国文化传统给予了更多关注。在国际上,“西方文化中心论”的时代正在过去,民族文化多元开展的历史合理性得到了更有力的肯定;工业东亚一定程度上具有东方特色的现代化模式的出现也从一个侧面加强了国人确立具有民族特色之现代文化的紧迫感。由此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了在现代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思想转变,人们对“文化重构”倾注了更多的理性思考。其中一个明显标志,就是在沉寂多年之后,中国思想文化界再次掀起了“国学热”。可以说,正是在“国学热”中,实现了现代文化论争主题的“中心置换”。与

先前历次的文化论争大多侧重于从文化之时代性的视角来反省、批判中国文化传统不同,如何更好地批判继承民族文化传统,在中国当代文化的建设中更为充分地体现中国文化的民族特质贡献于当代世界,成为“国学热”中备受关注的中心话题。正如有的论者在20世纪末指出的,“如果说,本世纪初学者们的任务是如何‘开窗’而让‘西学东渐’,那么,本世纪末的学者们的任务则是如何开门,而让中国文化精神走向世界,在新的世界格局中加入自己的声音”。

尽管“国学热”难免出现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情况,但是它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重大意义,却是应当予以肯定的。在以“以夷为师”为中国文化现代化之历史起点,经历了长期主要是对中国文化传统施以否定性批准之后,“国学热”的兴起可以看做是中国现代文化建设中真正完成了从重“破”到重“立”的历史性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它构成了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注重中国文化的现代重建,到真正完成从外在冲击到内在转化之转变的结穴处。这种转变必将对中国文化的未来发展,进一步产生深远影响。

### 三、民族文化慧命的延续与发展: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主要成就

回顾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历程,应当说,虽然道德颇为曲折但毕竟取得了相当的成就。概括而言,这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其一,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延续了中国文化的民族精神,为中国文化面向未来的发展争得了历史性契机。尽管中国文化在以往也曾遭遇过大大小小的危机,但它们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都不能与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的危机相提并论。这一危机有着内因外缘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中国文化传统在度过鼎盛时代之后,在世界历史的近代已陷入全面的衰退之中。认定中国文化早已死亡,这是不少西方的学家一度达成的共识。这种观点虽然不免偏颇,但它确实注意到了中国文化内在生命力正趋衰微这一事实。另一方面,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时代正是全球范围内“西方文化中心论”盛行时代。现代化被指认为是人类文化共同的发展目标并在相当程度上被等同于西方化,非西方文化被认为只能是在彻底抛弃自身民族传统的基础上,全盘照搬西方文化的现代化模式。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中国文化的民族慧命无疑面临着断灭的现实危险性。

令人欣慰的是,经过一个多世纪艰难坎坷,中国文化遭遇灭顶之灾的危险性终于得以避免,中国文化的民族慧命终于得以延续和发展。这固然是由于中国文化传统蕴含了可久、可大的内在生命力,但无论如何也与中国文化之民族慧命的现代承担者们为延续,发展中国文化而作出的自觉努力有着密切关联。从广义上讲,由于文化归根结底与政治、经济紧密相连,因而,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争取民族独立与建设民族国家的艰苦努力,都可以看作是为中国文化的开展奠定了基础。从精神文化层面看,中国现代三大思潮都堪称是为延续,发展中国文化的民族慧命作出了贡献。作为现代中国思想文化的主流思潮,中国马克思主义派构成了护持民族文化慧命的生力军。从“古今中外”之文化方针的阐发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之时代任务的提出,就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由于保守民族文化的基本精神构成了以新儒家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的基本理论立场,因而他们

对中国文化的热切护持也是自不待言的。与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特殊民族意识相联系,即使是全盘西化派,其主观愿望也是要建设“中国”文化。胡适明确认为,所谓“全盘”的西化在事实上是不可能的,由于文化自有其保守性,全盘西化的结果“当然是中国本位的文化”。同样,主张全盘西化最为彻底的陈序经也专门强调了全盘西化与民族意识的统一。经过国人一个多世纪坚苦卓绝的不懈奋斗,中国文化已没有了“断灭之虞”,其民族慧命经受住了存亡续绝的历史考验,尤其值得欣慰的是,由于历史的因缘际会,现代中国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的汇聚之地,这就为中国文化面向未来的发展准备了更为充分的思想资源。伴随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建设必将为中华民族文化慧命注入新的,更为深厚绵长的生机与活力。

其二,尽管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已完成了向现代转型,但经过现代文化因子的长期浸润,中国文化已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现代文化的价值取向与思想框架。

首先,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已完成了向现代转变。近代以来,在西方现代文化的比照下,中国文化传统遭到了来自内外两个方面的严厉批评。批评的焦点在于中国文化传统没有发展出现代科学与民主。中国文化关注的中心是以内敛的方式通过达到和谐来寻求人之生命意义的安顿。它对“技”与“艺”的关注也总是服务这一主题,因而很难发展出独立的学理系统,而只能流于实用。这样,尽管中国文化在历史上曾经发展出了高度的物质成就,但当人类发展到世界历史阶段,依然停留在工作技术水平的中国文化所具有的征服自然的力量就不可能与已发展出理论自然科学的西方文化同日而语;同样,中国文化传统虽然在奠基时代就已表现出了浓厚的民本意识,但由于它具有颇为鲜明的人治色彩,也由于历史发展的种种因缘际会,中国社会春秋战国之后就走上了长期的封建道路。在皇权专治的统治下,老百姓被看做是自身没有任何自主权利而只能接受专制权力之恩赐的存在者。这样,一方面是专制体制在对普通民众施以暴政,另一方则是因为没有发展出现代科学而陷于贫穷,中国传统社会的愚昧落后于此不难见出一斑。而处于前现代阶段的中国文化,却恰恰是以论证这一社会形态存在之合理性为其基本的理论落脚点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被限于封建社会的中国文化传统在基本价值取向上确有与现代化逆向的成分。经过一个多世纪现代文化的冲击等浸润,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终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纵观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历程,人们所着力掘发的传统精神资源,都自觉不自觉地集中在与科学、民主等现代精神相联系,至少是不明确反对现代精神的成分上。相反,那些与现代精神背道而驰的内容,则不仅因被轻忽而鲜有人提倡,而且还遭到了各方向颇具理论深度的批评。时至今日,可以认为,在基本价值取向上中国文化已基本完成了由前现代向现代转化,科学、民主、自由等现代精神已内化为中国文化的内在要求。

其次,中国文化已初步具备了现代性的思想框架。与对现代性的追求成为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的基本思想主题相表里,中国文化现代化的一个总趋势,就是如何在一个素重“意志”的文化系统中充分“升显”“理性”之基本精神。可以说,如何达成与意志相联系的德性与理性之间的内在连接,如何从素重德性的中国文化传统中发展出作为理性之承载者的理性主体,以为理性在中国文化中确立内在根据,构成了中国文化现代化基本的时代



课题。在一点上,现代新儒学是一个典型代表。或许是因为人们将中国文化没有发展出科学与民主归罪与儒学传统的反激,新儒家对如何在素重德性的儒家文化中接纳科学与民主的问题作了较多的论述。其理论成绩集中体现在第二代新儒家的镇重镇牟宗三在20世纪中后期所提出的“良知自我坎陷”说中。尽管这一学说遭至了多方批评,而且其有关理论也确有未安之处,但就其主观愿望而言,这一学说的基本意旨又确实是要在以往以园融无碍的形态存在的儒学本体中确立主客、能所二分对列的“对列之向”。换言之,亦即要在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传统中开出能够涵容现代性的思想架构。因此,在基本精神方向上,它不仅从一个表征了中国文化对现代性的基本精神已有了比较完整的理性自觉,而且所体现出的调适德性与理性,力图在中国文化中为理性精神确立形上根据的理论努力,对中国文化的现代新开展而言实有内在的必然性。在与后现代主义的比较中,有论者曾指出,新儒学实际上是否把整个学理系统完全纳入到启蒙理性的观念框架之中,这一论断虽然未必完全允当,但它确从根源上准确地抓住了新儒学是要按照以启蒙理性为核心的现代性为重塑儒学之现代形态这一理论特质,以充分突显理性之重要意义这一点上,新儒学堪称是现代中国文化的一个缩影。正如儒学的现代变革所表征的,随着现代化的推进素重德性中国文化逐渐演变成为理性精神所浸润的文化系统。过去片面注重主观境界的中国文化终于在接纳理智理性的客观架构方面迈出了坚实的步伐。不仅主观对列的科学理性架构已出现在中国文化中,而且现代中国人也正在由过去缺乏权利意识的“天民”逐渐成长为具有独立意识,足以作为政治实体的现代公民。具有现代意义的文化价值系统已初步确立。

其三,中国文化的世界化也迈出了坚实的步伐。近代以来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表明,尽管向西方学习构成了其主体内容,但两者之间事实上是一种双向互动的关系。近代以来一直与西学东渐相伴随的“东方西渐”的“暗流”就清楚地表明这一点。由此,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事实上是与世界化相伴随的,20世纪虽然是中国文化极度困厄的时期,同时也可以说是中国文化逐步走向世界的重要时期。时至今日,中国文化不仅不再被简单地看做是已僵死的“遗迹”,而且已融入“世界文明”之中,产生了相当的世界性影响。这至少在以下三个层面得到了明确的表现:其一,作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自1840年以来中国尽管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它依然还是具有深厚的中国特色的,依然还是透显着中华民族文化之基本精神的。享廷顿将当代中国依然称为“儒教国家”虽然并不确当,但却也以一种别致的方式折射出了当代中国与传统文化传统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内在关联。而今,随着中国国际影响的不断增强,中国文化也正在不断走向世界。其二,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特质在经过现代转化后,已在一定程度上融入了现代东亚社会,成为型塑现代东亚社会与文化的重要力量之一。现代化过程中“东亚模式”的出现与“亚洲价值观”的崛起就在一定程度上表征了这一点。其三,随着“世界历史”的不断发展,中国文化在西方产生了更大范围的影响。如果说汤因比、李约瑟等倡导人类文化将向中国文化复归、以南乐山等为代表的“波士顿儒学”的出现还可以说是某种特例的话,当代美国哲学家理查·罗蒂的下面一段话或可代表当代西方思想文化界对中国文化一般性态度:“在一

切非西方的文化间,中国的文化无疑是最古老,最具影响力,也是最丰富多彩的。人们或许因此而可以希望,在西方理解自身过程中最近发生的变化,将有助于西方知识分子从中国方面多多获益”。

#### 四、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张力:当代中国文化面临的困境

经过一个多世纪的艰苦努力,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已取得了巨大的历史性成就,这就为中国文化面向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在世纪之交的文化讨论中,有人正是据此做出了“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文化的世纪”的诊断。我们认为,虽然21世纪人类文化的发展不会简单延续西方文化中心论的发展轨迹,但不可能走向中国文化中心论。事实上,面向21世纪,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在已取得巨大历史性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深刻的矛盾和问题。全面探讨当代中国文化的存在境遇显然是本文所难以胜任的。立足于本文的特定视角,我们要指出的是,与中国文化有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这一基本的时代课题紧密相连,在当代人类文化面临着后现代转向的特殊历史时期,中国文化所面临的历史性困限在于:如果说,此前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之路虽然相当坎坷,但从前现代走向现代的基本取向还是颇为单一的,在西方后现代文化的比照之下,依然以现代化为基本价值取向的中国文化由于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张力而不能不陷入两难困境。

正如历史的发展已表明的,自文艺复兴以来,现代化逐渐成为人类追求的理想目标。它不仅在西方成为主导性价值取向,而且经西方文化的传播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深远的示范性影响。尽管现代化从起步之日起就存在对它的批评意见,但与人类一往无前地走向现代化的迅猛势头相比,这种批评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只是历史长河中的涓涓细流。随着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现代化的批评终于在西方酿成了一场全面性的思想运动,形成了后现代主义思潮。后现代主义对文艺复兴以来人类社会与文化的发展进行了从根反省,面对当代人类所面临的深重困境,对在西方文化主导下所成就的以启蒙理性的核心内容,以工业化为基本运作方式的“现代性”做出了全面的批判,并进而提出了“走出现代性”的主张。在后现代思想看来,“如果说后现代主义这一词汇在使用时可以从不同之处的话,那就是一种……认为人类可以而且必须超越现代的情绪”。因为尽管直至最近,“现代”还几乎总是被用作赞誉之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不再把现代性看作是所有历史一直苦苦寻求以及所有社会都应遵守的人类社会的规范,而越来越视之作为一种“畸变”。因此,“人们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我们可以,而且应当抛弃现代性。事实上,我们必须这样的,否则,我们及地球上的大多数生命都将难以逃脱毁灭的命运。”

尽管后现代主义作为一股社会思潮有着自身的局限,但并不能由此而轻忽其思想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后现代主义的出现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事件,它标志着人类对于自身前途命运的思考已指向了“现代”之后,而达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正因为如此,后现代主义再经出现很快就产生了较大影响,成为国际学术界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在中国,后现代主义与同样迅速产生了回响,以至于在进行世纪之交的回省时人们将后现代主义在20世纪末的兴起看作是中国思想文化界“特别引人注目”的现象

之一。

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及其现实影响无疑复杂化了中国文化在当代的存在境遇。当中国文化还没有全幅享受到现代化积极成就的时候,西方则已对现代化的弊病提出了全面而尖锐的批评,这就体现出了中国文化的当代发展与西方文化之间存在的时代性势差。因此,在西方文化发展历程中主要是以历时性的形态被同时挤压在一个平面上。这就不能不使中国文化的未来发展面临着深刻的困境与严峻的挑战。概要而言,这种困境与挑战至少包括了以下三方面的基本内容。

第一,在基本价值取向上,中国文化如何才能真正走出“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两难困境”?在现代与后现代的比照之下,一方面,由于现代对比起前现代所具有的历史性的进步意义?由于“现代”阶段的不可逾越,当代中国文化没有理由轻言解构和颠覆现代性,终止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另一方面,就人类文化面向未来的发展动向而言,现代化却又已处于被批判、被超越的地位。如果中国文化只是依然一条鞭地追求西方的现代化,那它岂不是只有永远落在西方文化后面亦步亦趋?

第二,在评价标准上,理解和诠释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系统、思想框架与话语体系怎样才是更为合理的?怎样才能更好地把握中国文化的基本理论特质及其特长与缺失?长期以来,人们开展相关研究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将中国文化放在现代化的背景之下,以现代性为基本的价值标准来对其予以论衡。在相当程度上,后现代主义正是要对现代性的基本价值系统予以颠覆乃至翻转。在现代性的比照下,怎样的评价中国文化的基本范式才是更为合理、合时、合宜的?

第三,在具体的思想资源上,中国文化的当代建设应当怎样更好地处理古今西多种文化资源之间的关系?后现代主义的兴起,使得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呈现出一种更为复杂的关系状态。一方面,作为西方文化之最新发展的后现代主义的某些理论特质与中国文化传统之间形成了相当尖锐的对立(如虚无主义、反基础主义、碎片化、平面化等);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在思想主题(由以对外在自然的追寻为中心变为更加注重人文内在生命意义的安顿)、价值取向(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言说形式(教化哲学、拟示哲学)等方面又确与中国文化传统之间具有一定程度的亲缘性与类同性。而与此同时,则是同属于西方文化的现代与后现代之间出现了相当程度的差异乃至断裂。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文化应当怎样在继续吸纳西方现代文化之犹长的同时,面对西方后现代的挑战?中国文化可以向后现代主义学习些什么?与此相应,我们应当怎样更好地批判继承自身的文化传统?面对人类多元文化并存发展的时代趋势,中国文化可以为当代人类贡献怎样智慧资源?

当代中国文化所面临的困境与挑战表明,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在今天又到了一个新的历史关头。由于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张力构成了上述困境的核心内容,如何对其挑战做出创造性的回应,就成为面向 21 世纪中国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课题。

## 五、结语：中国文化面向 21 世纪的双重历史任务

中国文化在当代所面临的上述两难困境，历史地证明了“综合创新”文化方针的正确性。中国现代：大思潮马克思主义派、自由主义西化派与保守主义现代新儒家派分别以“综合创新”、“全盘西化”和“中体西用”为基本文化主张。如果说“中体西用”论由于不可能带来中西文化在根本精神层面的真正会通，已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比较充分地暴露了其内在的局限，后现代转向则有利于我们更为真切地见出“全盘西化”论的根本制限。西化派主张完全照搬的显然正是西方现代文化。毫无疑问，在后现代性的比照之下，无论如何它只失去了被全盘因袭的价值意义。不同于偏于一隅的西化派和新儒家，中国马克思主义派植根于中华民族“百虑而一致，同归而殊途”和“会通以求超胜”的智慧精神之中，在文化建设中兼重时代性与民族性，鲜明地体现了综合中西文化之长以创造新的中国文化的精神品格。如果说，中国文化的现代化道路事实上是体现为文化之时代性与民族性的对立与互动（西化派与新儒家分别以偏执的方式突显了时代性与民族性对中国文化现代化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因而实际上是体现为一个“综合创新”的历史过程，那么，面对今天文化两难困境，除了以更为成熟的理论形态自觉地走综合创新之路外，可以说别无他途。立足于这样的认识，我们认为，面向 21 世纪，中国文化要想真正摆脱在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两难困境，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不容轻忽。

第一，必须切实挺立民族文化精神的主体性。在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全盘西化论曾经产生了广泛影响。西化思潮的基本偏颇，就是对自己的民族文化采取了虚无主义的态度，只知一味的照搬西方。如果说由于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历程是与西方学习相伴相随的，在现代性成为中国文化之基本价值追求的背景下，西化派的有关文化主张还能够一定程度上起到积极作用，那么，在今天，如果不能切实挺立民族文化精神的主体性，面对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张力就只能陷入左冲右突之境而无所适从。为此，必须根据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要求，确立民族文化的主体精神，按照“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以更为主动、自觉、开放平实的文化心态来指导、择栋、吸纳，融汇不同形态的西方文化资源，还可以说是走出两难困境不可或缺的理论前提。

第二，必须立足于新的综合与新的创造，明确中国化面向 21 世纪所应当完成的双重历史任务，新的综合与新的创造，既是综合创新文化方针的核心内容，也是中国文化生命面向 21 世纪进一步开展的内在要求。正如上文分析所显示的，自 19 世纪中叶以来，中国文化在由传统向现在的转型中经历了一个由极度困厄到复苏进而生长发芽的过程，其内在逻辑表现为由“外在冲击”到“内在转化”的发展演进。如果说，在“外在冲击”阶段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只能是主要以西方现代性来作为自己的基本型范的话，当进入“内在转化阶段”之后，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转型就已具备了挺立民族文化主体性的主体性，通过“以我为主”的发展而成就具有自身特质的现代文化形态的理论可能性。由此，面向 21 世纪，以现代转型的历史性成就为基础，中国文化民族慧命的进一步开展就逻辑地指向了新的综合与新的创造。由于今天所谓的现代性”仅仅体现了西方文化之成就与问题，因而它既不是完



备的也不应当是封闭的,面向未来的人类文化完全有可能通过各民族文化的交融互汇而成就更合理、更为康健的现代性。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赞同哈贝马斯关于现代性是一项尚未完成的事业的论断。立足于这样的认识,我们认为,要真正走出“两难困境”,面向 21 世纪的中国文化必须在学习西方的基础上,走出一条既师法西方又超胜西方的现代化道路。为此,必须完成双重的历史任务:一方面必须继续向西方学习的历史进程,以西方的现代化为基本的参照系,真正实现价值系统从前现代向现代转换;另一方面又必须坚决超越形形色色的“西方文化中心论”,面对多元文化并存发展,交流互汇的发展走势,借鉴后现代文化的警策性意义,以面向世界的眼界和心胸,通过充分掘发出中国文化传统所独具的优良民族特质,建立既体现时代精神又具有充分的中国民族风格与做派的新型文化,以求超越西方式的现代性,为人类成就一个对应于传统的,更为合理的“现代性”做出自己的贡献。

其三,为达此目标,必须摒弃因为机械地持守时代性之一维而坚持非此即彼之僵硬思考的思维模式,在古今中西的多种文化资源之间形成高度辩证的联结。正如人们已经注意到的,由于过于突显时代性这一维变,现代性思维往往在前现代与现代之间持守一种非此即彼的思考模式,而使两者陷入了尖锐的对立。同样,在今天,这种思考模式又被人们延续到了对于现代与后现代关系的思考中。如果说,强调前现代与现代的对立是为了维护在人类现代化过程中的特定历史时期西方文化对于非西方文化的中心地位,在走出了“西方文化中心论”的今天,人类文化更为重要的课题则是如何集中多民族文化共同体的智慧解决“地球村”所面临的共同问题。为达此目标,必须摒弃上述因为机械地持守时代性之一维而在各种文化资源之间坚持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僵硬思维模式。由于从前现代到现代、后现代之间存在着环环递进的关系,而前现代与后现代之间又有着“奇妙之暗合”的一面,面对中国文化的多重历史任务,我们完全可以将共时性地呈现在同一个平面上的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文化因子均看做是一个整体的“诠释圆环”中的不同组成部分,在挺立民族文化精神之主体性的基础上。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为“理解千古”,通过互诠互释、互融互汇,在古今中西的多种文化资源之间形成具有互补结构的辩证联结,以为“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新的综合与新的创造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源。

面对困境与挑战,中国文化的历史任务无疑是十分艰巨的。但是,我们坚信,面对人类文化多元开展的当代走势,有中国文化独异的精神特质为基础,有中国文化内蕴的强盛生命力作为保障,经过中国文化慧命之当代承担者的呕心沥血、不懈奋斗,伴随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文化当代建设的历史任务一定能够完成,中国文化一定能够成为 21 世纪人类多元文化中具有举足轻重之影响力的重要一元。

# 第一章：中国政治文化的成熟——青铜文化

人类的第一个阶级社会是奴隶制社会。从夏启到封建社会前夕，我国人类文化活动的记载，构成了奴隶社会文化史。这一时期是我国具有光辉灿烂古代文明的历史阶段。然而为什么这样一个最直接、最粗暴、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奴隶社会，会出现前所未有的高度文化呢？奴隶社会文化发达的原因是劳动有了进一步的分工，是出现了一些专门从事科学及艺术工作的人们和广大劳动者的劳动相结合的产物。虽然当时的奴隶不可能为了自己欣赏或需要而创造文化艺术，他们所制造的文化艺术是为奴隶主服务的，但不可否认奴隶制社会的文化艺术是他们的劳动结晶。

我国的奴隶社会始于夏，勃于商，盛于西周，衰于东周。中国古代社会的产生和发展，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即与那时以青铜器的生产和使用为特征的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二里头文化是我国的青铜时代文化，商代已是高度发达的青铜时代。所谓青铜时代，是指人类已经发明和制作了青铜器物，运用于生产和生活领域，使整个社会面貌发生了质的变化的时代。由于青铜文化代表政治文化，因而青铜制作的器皿就成为代表政治文化的礼器，礼器按照一定的组合，代表一定的身份和地位，并且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礼乐制度，这套礼乐制度在青铜时代对社会制度的维护和巩固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到春秋战国时期才逐渐瓦解。

## 第一节 青铜文化的风采

我国各地的博物馆，几乎都展示有青铜器。面对青铜器，我们往往感觉到一种震撼：硕大的形体，显示了青铜文化的恢宏；铜缘斑驳的外表，照示着青铜文化历史的久远。

中国进入早期青铜时代约在公元前 2000 年前。青铜器的出现成为人类划时代的重要标志。当它被广泛应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时，就使人类社会面貌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也使人们不由自主地被牵引着进入青铜时代。在悠久的历史岁月里，劳动人民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中国被公认为世界上文化发达最早的文明古国之一，而青铜文化则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青铜文化的发生、发展和衰落砌成了青铜时代。青铜时代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所谓青铜时代，是指人类已经发明和制作了青铜器物，运用于生产和生活领域，使整个社会面貌发生了质的变化，我国的商代已是高度发达的青铜时代，这时已有相当发达的农业、手工业和文字。青铜冶炼和青铜器铸造标志着社会生产力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青铜器的产生，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并推动了社会的总进步，因此可以把青铜文化作为一个广义的概念来理解。商代的青铜器使用广为普及，数量越来越多，制作越来越精。

商代青铜器的应用几乎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近一个世纪来，各地出土的商代

青铜器不断增多,精美绝伦的铜工艺品、种类繁多的铜日用品,逐渐成为礼器祀具的青铜彝器、抽象变形令人眼花缭乱的铜器纹饰、庞大建筑群的铜构件和铜饰物、金声玉振的音乐演奏及持干戈尔舞的铜像,都显示了那个时代文明的灿烂辉煌。青铜器制造业的发展和繁荣进而促进了社会其它方面的进步,它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更优越的物质条件,大大丰富了古代文化的内容。而社会的每一个进步都与使用青铜工具分不开的。有了锐利的青铜刀,可以用之于刻甲骨文,铸造各种各样的青铜器上的铭文,提高了书写的效率和水平,促进了文化的发展,为我们保存了大量的原始而可靠的资料。同时更由于它的价值昂贵,又为古代礼器的兴盛准备了重要的物质条件。

商代的疆域不断扩展,影响范围达到长江流域。这个时期中国青铜时代进入繁荣时期。青铜器生产数量大增,还出现了司母戊大方鼎、偶方彝、三联这样的重器。各地出土的色彩斑斓的青铜器,生动地勾勒了商王朝的疆域,也展示了商文化在神州大地上的传播和扩展。在青铜时代,拥有众多人口的都邑出现了,巨大的宫殿建造起来,灿烂的青铜时代,把中国古文明带上一个新的高度,为周乃至秦汉的辉煌奠定了基础。

这时的青铜器无不构思巧妙,刻镂精美,体现出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可以看出,无论是雄浑厚重、端庄肃穆的方鼎,还是意匠独具、精巧奇特的兽尊,以及各种各样别开生面的佳作,都具有格外的意味。因为这些青铜器是在商人迷信意识和世俗观念下应运而生的,它们既是盛物的容器,更重要的还是祭祀的礼器,既是表示身份等级的标志,更是地位和权力的象征,因而绝大多数青铜礼器都是经过精心设计和制作的。这些青铜器不仅表达了对神灵的虔诚,也反映出人类的聪明才智。这时青铜器的端方透着威严,雕饰透着机巧,形象地传达出那个时代的文化气息。

青铜器上的纹饰也明显体现出殷人重神的宗教观念,在大量的青铜器上最为常见的龙凤纹、饕餮纹、麒麟纹等等,多是一些怪诞形象的纹样,实际上是原始社会拜物教的残余。这种宗教意识传承下来,在商代得以发扬光大。因而将吉祥神圣的龙凤图案刻铸在青铜器上,标志着统治阶级至高无上的威严。龙的形象自原始社会以来就是华夏民族传统文化最有代表性的象征,而凤的图案也是由东夷文化的传人在鸟图腾的基础上衍生出来的,龙凤的结合将夏商文化凝聚一体,使中原地区的古老文明如黄河连绵不绝。那形态灵动、神采飞扬、风流万种、威风八面的龙凤,从某种意义上讲,只有王室贵族才能拥有,其实是借助龙凤的神秘宣扬自己的神威。

西周青铜器的文化意味更多地表现在礼器的现实性上,最突出的特点则是铸铭之器明显增多,长篇铭文大量出现。周人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大力加强教化措施,因而作器铸铭用以体现宗法礼制的威严。在商代,青铜礼器是王室贵族用于宗庙祭祀或丧葬活动的宝器;到西周,则以铭文的形式,使青铜礼器更获得一种法定的正统地位。长篇铭文的流行,不仅开创了风格独特的金文书法艺术,而且还保留了许多重大史实,使西周青铜器具有十分珍贵的史料价值。这些青铜器上的铸铭表明礼法的尊严,因而更具有规范社会道德的现实意味。

到西周中晚期开始形成列鼎制度。所谓列鼎,就是将造型和装饰相同而尺寸大小依

次递减的鼎列为一组,用作奴隶主贵族在祭祀、宴飨、丧葬等礼仪活动中表示身份的标准器。这种列鼎制度是西周礼制的充分体现,它对维护奴隶社会的等级制度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一直沿用至东周时期。它使西周青铜器艺术变成了一种奴隶制的等级艺术,因而限制了青铜器多姿多彩的发展。尽管西周青铜器铸造艺术较商代更有进步,但强力的规范束缚了艺术的创造,这就使青铜艺术在走向辉煌顶峰的同时,也由僵化逐渐走向衰落。只是到了春秋战国,青铜器又因诸侯称雄显出地方特色,风格趋向华美瑰丽,但同样也失去了往日的雄浑,青铜时代终于失去了昔日的风采。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和新的生产关系的出现,使奴隶制度“礼崩乐坏”,青铜器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是使用的规格,打破了旧的礼教。春秋以降,诸侯们的僭越行为日益普遍,大夫僭用诸侯之制的也司空见惯,甚至有的诸侯所用礼器,比天子还要豪华,所用礼器的数目,竟比天子的还要多。这反映了旧的统治制度和统治秩序的瓦解。第二种变化是形制上出现了新的式样。奴隶主阶级礼器的属性渐渐消失,日常生活器物增多。最后,随着封建社会的形成,作为地位象征的礼器也趋于衰败了。

青铜文化广义是指夏、商、周青铜器时代文化;狭义是指青铜器文化,即青铜器所反映、代表的内涵;而一般泛指夏、商、周时期青铜器的制作应用给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经济、政治、思想、意识等方面带来的影响和打上烙印及对以后社会的发展所起的作用。

我国青铜器的出现是在夏代以前,夏代得到进一步发展,商周成为青铜器制作及使用极其广泛和全盛时期。

正是因为青铜器,特别是青铜工具较普遍地使用,生产力得到飞跃提高。于是,商周两代就成为我国奴隶社会的光辉时期,到了周代更是如此。

商代最大的传世青铜器有“司母戊鼎”,重八百七十五公斤。花纹精巧的有“鹿鼎”和有象禽兽形铜容器。商代青铜器多数是花纹深厚繁缛,后期的器形多长方形——特别是鼎。铜器上的铭文也较短。

西周继承了商代的青铜器铸造技术,并加上了自己部落的色彩。周初的铜器,圆形重器较多。其特点有:一是花纹多由繁缛趋向朴素大方;二,铭文大大增多;例如有名的“毛公鼎”铭文长至四百零三字。另外,周代铜器出土的数量远较商代为多,也是青铜器铸造术有了发展的表现。

西周后半叶和春秋时期,青铜器铸造技术已由王周扩散到列国,甚至比较落后的徐、楚诸国也都自己铸器。当时青铜器的器形已比较稳定,花纹则又趋复杂,字体由商与西周初年的雄峻转向圆融浑厚,列国也各有不同的风格。

到战国时,器形又趋轻便,花纹则倾向细腻。除铸花以外,又出现了刻镂、鍍金、错金银器。

大的礼器重器如此,其它武器、利器形制由商到战国也有很多的变化。如车战所用的“戈”,商代有“援”无“胡”,战国时则又增加了“小枝”的戟。戈戟上的“穿”也逐渐由少而多。从而可以看出器物均是随时代需要而发展的。另如“剑”也是到春秋战国时才出现较多。也出现了青铜农具,但并非普遍。可能只奴隶主们掌握少量,广大劳动者在出现铁器



以前,仍是以石、木器具耕耘。金属货币是出现在春秋战国之时,春秋时齐国的管仲修太公九府圉法,始铸铜币。

所谓礼器,一般认为是古代贵族在进行祭祀、丧葬、朝聘、征伐和宴享、婚冠等活动时举行礼仪所使用的器皿,指青铜器中的鼎、簋、觚、豆和钟、钺等。进入奴隶社会以后,奴隶主政权进一步被神化,其统治秩序尤其是等级制度进一步礼制化,作为这一秩序和制度的体现物——礼器,也随之日趋完备和制度化。礼器在这一历史时期,对于奴隶制度的确立、发展,起了积极作用。至商代早期,使用礼器采取系列化配合形式。这时的礼器主要有鼎、簋、盘、尊、爵、斝、觚。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青铜器也伴随着礼制的隆盛而日益考究。不仅器类丰富了,更重要的是各种器物的组合,也明显地礼制化。西周前期用鼎已经出现了多个大小相次的组合,后期则愈为完备。礼器对于维护各级奴隶主的统治地位,以及内部的统治秩序,是有重要作用的。由于礼器的作用,奴隶主贵族就将其中在宗庙祭祀时最常用而又特别重要、特别宝贵的礼器,视为祖宗和社稷的化身。传说,夏禹曾铸九鼎,用来象征九州。夏灭,鼎归于商;商灭,鼎归于周,成为传国重器。此后,“问鼎”遂成为企图夺取政权的同义词。不仅九鼎,凡是宗庙所用的重要的礼器,都属于“重器”。那时,灭掉某国,就要将该国的重器掠走或瓜分。

## 第二节 青铜文化的特色

夏、商、周青铜器文化首先表现为:族群代兴历史的结束与统一化文明进程的开始。从夏代起中国开始了“家天下”的历史。从夏初一直到周人建国之前,历史的显著特征是族群的代兴。夏朝建立了,契之后的商人祖先王亥则有易去牧羊;而当商代崛起,周人则是“夏之衰也,自窜于狄狄”。这种此起彼伏的过程直到西周实行分封制才告结束,多族林立的中原地域上,统一的文化进程才正式开始,西周王朝实现着中华民族的新聚合。

尚忠的夏文化。夏是我国第一代王朝,时间约从公元前 21 世纪到公元前 17 世纪,历时近五百年。夏王朝的活动区域集中在河南的西部和山西的南部,这是夏的大本营,以后不断向东扩张,一时间曾远达东海之滨。夏是“家天下”,尽管这个王朝也有相当的部族下属,如周人的祖先曾在夏朝做过“后稷”农官,其它如 韦、顾、昆吾等与夏一直有密切关系,但总的来说,夏王朝基本是以夏人为核心的部落联盟性质的国家。夏代不仅不是真正政治统一的王朝,由于它的“父传子,家天下”,反而将王帝以来由宗教文化亲和力所促进的人群辐辏的历史趋势,暂时中断了。夏代开始了族群相处的一种新的关系模式,那就是战争征服。强大族群对弱小族群赤裸的战争关系,始于夏,盛于商,而终止于西周。借助先秦时对夏代情况的记述和现代考古发现,夏文化某些重要特征还是可以把握的,即所谓的“夏上(尚)忠”。什么是“忠”道?从鲧、禹治水的故事,可以略作推测。鲧因治水不当被治罪,而禹仍然恪尽职命,劳形天下,这就是忠。面对洪水再三肆虐,人们仍‘尽力沟洫’,没有放弃故地,在治理自然环境方面作出了前仆后继的不懈努力。这绝不是禹或某个人的“尽力沟洫”,而是一个人群脚踏大地,在大自然的风浪中百折不挠精神的体现。勇于与洪水搏斗,在大地上开辟生存空间的实干精神,是夏族文化的基本精神气质。